

引 子

一位文学家说过：历史——如长江大河。能在长江大河中兴风作浪的，不是功臣，便是罪人。

“阎王爷总算长眼睛，把这个魔鬼招回阴曹地府去，不让他再造孽了；他再活下去，可怎么得了啊！他非把人折腾得死绝了才算数！”

这是1975年12月16日晚8时，人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中听到一个讣告之后，不约而同发出的反应。

这一天，天色阴沉，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是入冬以来最冷的日子。阴冷的天气，令人郁悒；无休止的“文化大革命”，更加重了人们内心的压抑感。除了刺人神经的高音喇叭在声嘶力竭地吼叫，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氛正笼罩着美丽而又古老的首都北京。

人们忽地听到了这个消息，从郁悒中感到一阵欣慰。他终于离开了人世，这不仅是思想界的福音，也是全国人民的福音。有人弹冠相庆：“来，干一杯！”有人端起酒盅向志同道合者贺喜：“但愿阎王爷把这些造孽的人，一个一个都招回阴曹地府去，祝他们早日归阴！”

这个“他”究竟是谁，为什么民间对他有如此大的愤恨？

这个讣告，报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去世的消息。康生，在神州大地可谓家喻户晓，一提起他，人们不免都会谈虎色变。这不仅是因为他权势盖天，而且也是由于他多少年来凭那阴险、狠毒的一手，在宦海生涯中得以经久不衰。在那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一个人的命运，宛如走马灯，忽明忽灭，唯独他是例

外。虽然他也并非百战百胜，而是曾经失过利，呛过水，但他呛水时，张张嘴，甩甩头，镇静一会儿，就又能继续在政治漩涡里打滚，扑腾上来，把对手一个一个地置于死地。

他的这一手，在中共党内是独一无二的。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及“二月兵变”、“六十一人案”、“保女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都立下了盖世“功勋”。他是“文化大革命”的“擎天柱”。如今他的倒下，令震撼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都黯然失色了；对显赫一时、以造反起家的暴发户们，也无疑是敲响了丧钟。

一、胶县富户

1898年冬日的一天，夜幕刚刚降临，空中纷纷扬扬地地起了大雪。古老的大台柱，笼罩在一片黑白混沌之中。

高门大院的张家，过早地把大门关上了。院子里的东厢房，不时传出一位女人的痛苦呻吟，一阵紧似一阵。

忽地，“呜哇，呜哇……”一阵婴儿清脆的啼哭，打破了院里令人窒息的沉寂。张发祥正在正房的客厅里，焦急不安地走来走去。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自远而近，房门打开，老妈子兴冲冲地跑了进来，道了声万福：“恭喜老爷，太太生了个公子！”

张发祥脸上露出笑容，兴高采烈地奔向东厢房。他早已胸有成竹，如果是生个儿子，就叫张旺，取张家人丁兴旺之意。

这个刚出生的婴儿，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他后来几度易名，最后叫康生。

张发祥抱起刚刚洗过的婴儿，仔细地端详着，顿时喜上

眉梢。“小公子长得多大，”老妈子在旁边讨好说：“大眼睛，多白净，多像老爷呀！将来准聪明伶俐，一定是大富大贵的命。”张发祥笑得嘴都合不上了。

张氏家族，住在山东省胶县利民区大台庄，是当地闻名的祖传大地主，家大业大，有钱有势。

康生的曾祖父名张鸿义，是个贡生。贡生，在清代，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它是由府、州和县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是世人谋求飞黄腾达的一条必由之路。

康生的祖父一代，有兄弟两人，兄叫张抱先，弟叫张葆元（即康生的祖父），都是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

康生的父辈，弟兄三人。老大叫张呈祥，是个廩生。廩生，即清代由府、州和县按时发给银子、粮食以补助生活的生员。其堂号称“北树德堂”，他是康生的伯父。老二张发祥，秀才出身，堂号称“南树德堂”，他是康生的父亲；老三张其祥，堂号称“宝善堂”，他是康生的叔父。

张家原有六七千亩地，除少量留下种菜，其余都租给佃户，每年收地租几十万斤，这在胶县是首屈一指的富户。

到了康生父辈这代，一家分为几股。康生家仍然有近两千亩地，房屋几十间。那高门大院，青堂瓦舍，雕梁画柱，远看就像一座神秘威严的城堡，鹤立鸡群，颇有山寨主的威风。

张旺渐渐长大了，他聪明伶俐，也很淘气，是父母的骄子。张旺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六；在亲兄弟中，是最小的一个。老儿子，又聪慧机灵，自然是另眼相看了。张发祥望子成龙，他把光宗耀祖、扬名显亲的指望，都寄托在张旺的身上。

转眼张旺就八岁了，他像匹野马似的，只知道昏天昏地的贪玩；张发祥为了管住张旺，特意请来一位私塾先生，给

他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等让他学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类。张旺一直念到了 13 岁。

这一年，正是天下大乱的 1911 年。神州大地，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辛亥革命。

平地一声雷，主宰神州大地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被推翻了。真龙天子，金口玉牙，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皇帝，居然被凡夫俗子推下龙廷的宝座。这是亘古未有的新鲜事。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稀罕。但废除帝制，却还是头一遭。

住在偏僻农村的张家，是一个封闭式的家庭。虽然革命后时局变了，但张家依然因循守旧，走着往日的老路，就像一滩死水里扔了块石头，激起几个浪花后，转眼又平静下去了。

张家的匾额、堂号，丝毫未变。“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依然供奉在正房中间的客厅里。与此同时，胶县县城已经办起了“洋学堂”，一些开明士绅，纷纷把子女送去读书，学点新知识。唯独张家不同。有人劝张发祥也随着潮流走，但他却不屑一顾地说：“我孩子不学那些洋玩艺儿，那是离经叛道，违背老祖宗的东西。”就这样，张发祥在张旺 13 岁念完私塾后，宁肯让他闲散在家，也不愿送他去洋学堂。

5 年的私塾，张旺一知半解地懂得了些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历代王朝兴衰……等等。在农村，也够得上识文认字的小书生了。但他又是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还晃荡的人，整天吃饱了，没有事干。他和同龄的几个哥儿们，从早到晚，东游游，西逛逛，谁也管不住。

张旺的衣着打扮，在大台庄，也十分显眼。虽然他 13 岁时，长袍、马褂、疙瘩帽，这身标志清王朝的国服，已随着

清王朝的灭亡而进了坟墓，但他却与众不同，仍然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疙瘩帽，后脑勺上还拖着—根又长又大的辫子；手里拉着板胡，嘴里吹着笛子，同拜把子哥儿们，喝酒，赌博，吹拉弹唱，甚而打架斗殴，闹得鸡犬不宁，四邻不安。

大台庄议论纷纷：张家知书达理的，怎么出了这么个有娘养无娘教的东西。从张家门口过，见到张家大门上贴着苍劲有力的对联：“家有余粮鸡犬饱，架上书多子孙贤”，有人狠狠啐了一口：“呸 蛙羊头 卖狗肉 什么子孙贤 是无赖！”

夜！万籁俱寂。张发祥在客厅里，反剪双手踱着步。邻人对张旺的斥骂，他已听到。如此下去不只败坏家风，也会把他自己给毁了。俗语道：“养不教，父之过”，再不能让他这样放荡不羁了。“这个孽种！”张发祥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地横了心：“非严格管教不行，这简直是个败家子！”第二天，他便把张旺关了起来。

张发祥以为如此一来，儿子就会改邪归正。但张旺已不是三五岁的孩子，眼珠—瞪，吼叫几声，就会吓得魂不附体，乖乖听话的。眼下的张旺，不仅脑子灵，点子多，还有一群为他通风报信、出谋划策的拜把子兄弟。单靠关起来，是无法让他收敛野性的。

只要张发祥不在家，张旺便可以在“囚室”里邀朋会友，商量对策。张发祥—迈进大门，信息立刻会传到“囚室”，顿时鸦雀无声。就这样，经过几天的策划，搭救张旺出“狱”的妙计终于想出来了。执行这条妙计的最佳人选，自然是张旺的好友陈舜庭。他能说会道，足智多谋，是张家的常客。

—天傍晚，陈舜庭走进张发祥的屋里。“怎么，”张发祥抬头望望，气鼓鼓地说道：“你是来做说客，为张旺说情的吧？我告诉你，张旺不改邪归正，就休想出去，你们在—块都干

了些什么？”

“大伯！”陈舜庭以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和张发祥对阵。他笑眯眯地说：“在这方圆几十里内，哪一个能有张旺这样绝顶聪明。”他一伸大拇指头：“不是我夸海口，他可是百里挑一呀。让他出去闯闯，说不定将来会有出息，成一个大人物呢！就连宋朝创业主赵匡胤，年轻时候还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最后夺取天下，当了开国皇帝，威震八方，名扬四海。有的人，虽是老实，可什么也干不成。”

这一席话，令张发祥有点动心。自把张旺关起来后，张发祥有如手抱刺猬，抱着扎手，扔又扔不下，进退维谷。张旺已不是小猫小狗，而是个大活人了，总这么关着，也不是长久之计，传出去也不好听。“让他出去闯闯吧，成不成气候，听天由命了！”张发祥下了决心，但一定要有几条约束，不然出去后，还像现在这样，那不是要惹大祸吗？想到这，他讨价还价地说：“出去可以，但有个条件。”什么条件？陈舜庭见大功告成，高兴极了，他一拍胸脯，打下保票：“大伯你说吧，我保证他做到。”

“你们必须去念书。”张发祥严肃地说：“你们都不到 20 岁，正是求学上进的时候，不能荒废学业，我们张家是书香门第。张旺念了 5 年私塾，那顶什么用？真正光宗耀祖、扬名显亲，念那么点书太少了，还要继续深造！”说到这停一停后，接着又道：“第二，出去不能惹祸，要安分守己，规规矩矩，不能让人指着后脊梁骂！”陈舜庭满口答应。

打这起，张旺改名宗可。他从“囚室”放出来后，同拜把子兄弟陈舜庭一道去了青岛礼贤中学读书。这是一间赫赫有名、非一般贫寒子弟所能入读的学校，在德国占领青岛的第 3 年，即 1900 年，由德国同善教会牧师理查德·卫立姆一

手创办。

礼贤中学的教学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把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四书五经”和西方社会的科学知识糅合在一起；它规定了约法三章：一，闭门读书；二，不过问政治；三，不参加社会活动。张宗可在礼贤中学的几年，学到了在穷乡僻壤的私塾里学不到的许多东西，他对德国崇拜得五体投地。

1917年，张宗可19岁，他从礼贤中学毕业了。他本想找个工作，从此脱离那落后的偏僻乡村。可是，天不遂人愿，不论在政界，抑或军界，都未能谋得一席之地。无可奈何，只好打道回府了。刚返故里时，张宗可整天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念了这么多年书，连个出路都找不到。他消极悲观，怨天尤人，颇有怀才不遇之感。

不久，张宗可突然遇到了一件使他丧魂落魄的事。

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几个土匪突然从墙上跳进张家。“都给我滚起来！”持枪者双目瞪得溜圆，杀气腾腾地吼叫着。顿时，张家老小慌作一团。张宗可的哥哥，见势不妙，撒腿便向外跑，只听“叭”的一声枪响，人应声倒在血泊里，当场被打死。

土匪翻箱倒柜，把张家折腾得底朝天。全家吓得魂飞天外，惶惶不可终日。“一天也不能呆下去了！”洋学堂毕业的张宗可，心惊胆颤地对他父亲说，“快搬到县城去吧！”

一筹莫展的张发祥，一时没有了主意。不走吧，人命关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土匪会再血洗大台庄；走吧，故土难离，房子都得扔下，还要花一大笔钱重新置业。他犹豫了一阵，最后终于打定主意：保命要紧。他在诸城县城买了一块地皮，大兴土木，很快就建成了一幢公馆。

新建的公馆，气魄非凡。深宅大院内，一排正房，加上东西厢房各六间，另有一幢两层小楼。临街一头，还修了一个讲究的门楼。张家又成为诸城县的名门望族了。

一到诸城。张宗可即改名为张裕先。1918年，张裕先已是20岁的青年，他进了诸城教师讲习所学习。

一年后，张裕先在教师讲习所毕业。他旧念不忘，仍想在军界和政界里谋职，但奔波一阵子，都无功而回。最后，只好到他最看不起的地方（所谓“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即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教书去了。

就在这一年，以巴黎和会为导火线，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学生们义愤填膺，高举反帝反卖国政府的大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很快，这股革命的浪潮，由北京传到青岛，再传到诸城。它像冲开闸门的波涛，水急浪涌，泥沙俱下，将抱有各种人生观的人都卷了进来。年轻的张裕先亦不例外。

1924年夏天，张裕先又告别家乡，奔往当年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张裕先离家出走的原由，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他赌钱，欠了阎王债，呆不下去了；另一说是他在家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混不下去了。

一到上海，张裕先又改名张耘，进了上海大学读书。这间大学是1923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在原东南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联合创办的。李大钊推举原在上海震旦大学的同窗好友于右任担任校长。但于右任只挂个名，真正掌握学校管理大权的，是总务长邓中夏，教务长瞿秋白。这是中共为自己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张耘在上海大学读的是社会科学系，系主任由瞿秋白兼任。瞿秋白是一位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学者，既主持教务行政工作，又亲自向学生授课。

这间大学可说是藏龙卧虎之地，它集中了未来的国家栋梁，中共的精华。学校里洋溢着革命气氛。巨大的革命洪流，冲击和考验着校园内的每一个人。

夜幕降临了。嘈杂的上海，开始宁静下来。正在上海大学就读的张耘漫步在黄浦江畔，反复思忖着自己的出路。孔子曰：三十而立，自己已 26 岁，离 30 不远，该作出抉择了。摆在面前的出路，明显的是两条：一条是花一大笔钱，托托门路，在军界、政界或教育界，混上一个差使，将来运气好了，说不定能捞上个一官半职。可是，这笔钱从哪里来呢？天上掉不下来，家里又闹翻了。再说，也找不到这样有力的后台。“此路不通，”他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道：“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手中无钱，谁给你白推磨？！”

另一条路，是把“注”押在革命上面。无疑，这是要冒风险的。但是，既有那么多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参加了进来，他们都不是凡夫俗子，而是才华出众的人，这股势力是不能小看的。现在，鹿死谁手固然未见分晓，但未来的天下很可能是属于他们的呢！刘邦在小沛时，不就是手无寸铁的区区小吏吗！后来却成了汉高祖。豁出去了，冒一次险吧。如今积极参加打江山，将来一旦夺取天下，总会论功行赏的。赌钱还有赢有输呢，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于是，他决定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1925 年，是他生命旅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这一年的 2 月，上海爆发了闻名世界的“二月罢工”。27 岁的张耘，参加了这次罢工。这是他入党后的头一次革命活动。

通过这次实践，他感到自己有非凡的才能，虽然暂时还

不能同党内的一些著名领袖平起平坐，但相距也不会太远，他要在中共夺取天下的战斗历程中显露身手。他把自己和同辈的党的骨干作了比较，论文化、论能力，决不会低于他们。只是他晚来一步，没有捷足先登而已。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周瑜不是比鲁肃、黄盖资历更浅吗？一个人的成就是由机遇、勤奋、才华构成的。眼下勤奋和才华已具备，所差的是机遇了。“等吧，机遇、运气总会有的！”他心里这样盘算着。

同年夏天，张耘和好友孟超、李宇超一起回山东诸城探亲。他是以当时最时髦的国民党左派身分，出现在父老乡亲面前的。他走起路来，昂首阔步，神气十足。前来探望的，打听消息的，谋求出路的，络绎不绝。张耘为此而感慨万分。一年前，他因为欠赌友的阎王债和调戏父亲的小老婆，被赶出家门。那时，他简直陷于“虎落平阳被犬欺，凤凰落魄不如鸡”的处境，谁都看不起他。哪知时来运转，一进上海大学，便找到了出路。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不是别的，而是天时地利人和加能耐那些过去为追讨阎王债曾经要对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赌友们，也都一反常态，登门赔礼道歉，并想借重他的权势，另谋出路。而他，都满口应允：“有机会，我一定帮忙。”

他父亲也改变了态度。一年多的时间，儿子便有这么大的出息，虽然还没有爬上显赫的地位，但已算出类拔萃了。这次回来，尽管不是光宗耀祖，扬名显亲，毕竟也替张家增添了光彩。儿子过去的一切不良品行，顿时都烟消云散了。张发祥笑逐颜开，热情地款待张耘，有这样的好儿子，他感到自豪。

一向死气沉沉的张家，这时突然热闹起来。亲友们不辞劳苦，长途跋涉，专程登门拜访。“三岁看老！”亲友们奉承

说，“张旺小时候，我就看他有出息。多聪明的孩子，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在咱们这方圆几十里内，你能挑出第二个吗？”亲友们的一片赞扬声，令张耘踌躇满志，得意万分。他在家住了一段日子后，便返回上海了。

1926年10月23日深夜，酝酿已久的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终于爆发了。担任上海大学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的张耘，积极组织上海大学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

其后，于1927年2月和3月，张耘又参加了上海工人的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时，他已担任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在充满激情的工人运动的巨大浪潮推动下，血气方刚的张耘，双眸放射出闪闪光芒，他似乎从未来中国的光明之中，看到了自己的出路。将来的天下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自己是其中的一员，又是领导者，名誉、地位和权势，自然不在话下了。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年的4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突然与中共翻了脸。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突如其来的袭击之下，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这严峻的日子里，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有跪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的；有夹着尾巴落荒而逃的；有踏着烈士血迹继续顽强战斗的。当然，也还有玩弄权术的投机者，他们总是在伺机窥测，以求一逞。

权术，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因应了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长期存在着，并不断有所发展。它既是一门学问，又是一种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者，可以一步登天；反之，弄巧成拙者，则会招来身败名裂之祸。

熟悉中国历史的张耘，对盛行于封建社会的权术，深感兴趣，而且他还将现代的“生意经”、“赌博经”与之糅合到

了一起。在他看来，眼下搞的政治投机，就是一种权术的运用，它虽不是现钱交易，却有可能在将来为他赢得权力和地位。目前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机应变，看准机会下“注”。

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都作了批评，最后更换了中央领导，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中央总书记。

机灵的张耘一眼便看出，向忠发这位总书记，是聋子的耳朵——虚设，他缺才少德，没有文化，性格粗暴，处理问题鲁莽，在他身上下功夫，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党的实权是在李立三手里，在李立三身上下功夫，投点“资”，准能名利双收。

正是这时，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激动地说：“我认为李立三同志，担任领导工作这段时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很多人作了无谓的牺牲，令人很痛心，再也不应该这样蛮干下去了。”

张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看准这个火候，作了针锋相对的发言：“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他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指责批评李立三路线的人说：“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顷刻间，他得到了李立三同志的赏识。李立三没有辜负张耘的一番苦心，很快地把他由江苏省委组织部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然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1930年9月24至28日，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委托，召开了党的三中全会。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遭到了批评。

张耘瞠目结舌，吓出一身冷汗。好险呵！政治舞台，也和赌场一样，一“注”押错，就会输个精光。必须当机立断，马上煞车，再不转弯子，就会成为李立三的殉葬品。想到这，他一反常态。“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唯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他翻脸不认人，严厉地斥责李立三说：“你领导这一年多，使中国革命受到了多么大的损失，让人多么痛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还坐在指挥台上称王称霸。”他冷讽热嘲地说：“没有那个金刚钻 就别揽那个瓷器活！”

张耘这反戈一击，很奏效，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原来是一场虚惊。”他心里暗暗高兴，这次所以能够化险为夷，就是因为根据“风向”及时转了“舵”，今后要好好地运用这一诀窍。

李立三下台了，今后谁又是掌握中央大权的铁腕人物呢？向忠发虽然名义上仍是总书记，但他是死狗扶不上墙的窝囊废。他看准了王明是未来中央的实权派。

王明，原名陈绍禹。他早在1925年赴莫斯科学习时，就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被委任为学生支部局副书记。书记则是一位苏联人。

王明的为人，狂妄自大，夸夸其谈，野心勃勃。他认为莫斯科远离祖国，万里迢迢，鞭长莫及。在这块天地里，是苏联当局说一不二。于是，他百般奉承米夫。他的领袖欲，驱使他想关起门来做皇帝，培植自己的一股子势力。他笼络一帮人马，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小集团。

1928年夏，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际，党的领导人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每次会谈都由王明担任翻译。善于钻营的王明，在很短的时间内，

便掌握了中共的一些内幕。他更加得意忘形了。他把那些未曾在苏联留学过的领导人看成是“土包子”自视高人一等，是有资格担任中央领导的党的精华。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是书香门第出身，颇有文化修养，待人和气，不端架子。他经常深入留苏学生中，关怀他们，听取意见，并在思想上帮助他们。

中国留苏学生，对苏联当时搞的反托派斗争，耳闻目睹，身受其害。运动一来，刹那间，托派帽子满天飞，把好端端的一所大学，变成个森严恐怖的世界。学生们将有关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瞿秋白。他同情学生们的遭遇，坦率地向苏联当局提出意见。他没有想到，此举却得罪了苏联当局。

当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有一条划线的标准。谁无条件地拥护他们的反托派斗争，谁就是响当当的左派；谁不拥护他们的反托派斗争，谁就是右派。瞿秋白居然敢提意见，这自然是离经叛道了，也因此而失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信任。

这一情况，王明看得一清二楚。他心里像明镜似的：要想飞黄腾达，离开苏联和共产国际这个后台是寸步难行的；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若不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加冕”，他的位置是朝不保夕的。因此，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巴结、讨好他们。

此刻的王明，洋洋得意，一想到将来自己会成为叱咤风云、主宰乾坤的大人物，便腾云驾雾起来。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29年夏，他被派遣回国。苏联和共产国际赋予他一个重要使命，即让他替代李立三，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孤芳自赏的王明，以“钦差大臣”的身分，威风十足地回到了国内。

王明回国之际，正是张耘在李立三身上下“注”之时。李立三也是个自命不凡的人，他根本就没把王明放在眼里。以李立三马首是瞻的张耘，有一天约见王明，“中央决定让你到上海南洋烟厂担任支部书记，”张耘冷冷地说：“你先在基层锻炼一个时期吧！”

顿时，王明犹如触电一样，浑身肌肉收缩，额角上冒出虚汗。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领袖和一个基层单位的支部书记，简直有天壤之别。前程似锦的美梦，刹那间化为乌有。自以为手持上方宝剑的王明，怎么也没想到会遭到这样的冷遇。难道苏联和共产国际说话不灵了？但他很快便冷静下来，胳膊拧不过大腿，暂时必须屈就一下。“李立三是反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他暗自咬牙切齿，这一剑之仇，迟早要报。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俗语道：小不忍则乱大谋。薛仁贵挂帅前，还当过伙头军；韩信还受过胯下之辱。大丈夫要能伸能屈，他自我安慰着。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精明的张耘，此时就没有看出王明的来头。因此，王明回国后，张耘曾积极参与了李立三接连给王明的两个下马威。

第一个下马威，是在1930年3月10日。

在这之前的一月份，于上海闸北地区，党召开了一次秘密集会。会议正在进行时，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察、特务突然闯了进来。王明被捕了。平时惯于唱高调的王明，在节骨眼上，却成了一个胆小如鼠的怕死鬼，还没有给他上刑，便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幸亏党组织采取了果断措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王明也被营救出来。

事后在讨论这次事件时，张耘慷慨激昂地说：“这种贪生怕死的人，应该给以严厉的处分。平时那么狂妄，在敌人面

前骨头又那么软！”最后，中央政治局以丧失警惕为名，给予王明以警告处分。

第二个下马威，发生在 1930 年 7 月。

在一次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会议上，早已憋着一肚子火的王明，终于忍不住了：“李立三的所作所为是左的一套，是错误的，他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他还那么自负、专横，这样下去，中国革命就有被葬送的危险。”

早已决心在李立三身上押“注”的张耘，认为这正是为自己捞取利益的好时机。“反李立三就是反党”，张耘说：“应该给王明这个反党分子应有的处分。”在他的建议下，王明被戴上了“右倾”、“小团体活动”的帽子，并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料到，不几个月，政治风云突然发生剧变。1930 年 10 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大驾光临，亲自来指导中国革命。同年 11 月 19 日 中共中央又接到共产国际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十月来信”。

这个情势对王明来说，真是个大喜讯。他因祸得福了，处分变成为受左倾路线打击的政治资本。他陡然身价百倍。

“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也该显显身手了！”他有一种蛟龙得水的心情：“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到捍卫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时候了！”他利用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立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双重的角色：一个是坚决拥护苏联和共产国际路线的“共产党人”；一个是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的“英雄”。有这两张王牌，外加扮演“摄政王”角色的米夫的“保驾”，坐上中共中央头把交椅，是十拿九稳了。

米夫手里攥着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秘而不宣，却偷

偷地向王明透露。这时的王明，既不是中共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破格享受了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待遇。

“我完全拥护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王明向米夫激动地表态说：“但我们党内，情况也很复杂。有的人，天老爷是老大，他是老二，未必把共产国际放在眼里。”他一挥拳头：“必须先给头面人物来点颜色，只要把李立三拉下来，其他人也就老实了。”

“你说得对，正合我意。”米夫哈哈一笑，拍拍王明的肩膀，鼓励他说：“在这关键时刻，你能同共产国际站在一边，这很好，将来在会上，你要积极地站出来哟！”

王明受宠若惊。他对米夫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一拍胸脯，打着保票说：“为了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反对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我王明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随后，王明废寝忘食、昼夜突击地赶写了《两条路线》的小册子。1932年在莫斯科出版时，又把它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是王明的施政纲领，比起李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是左得出奇。

王明抓住李立三的错误，大作文章。“我因为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在党内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打击。”他慷慨激昂地控诉：“在我们党内，正气受打击，邪气却占了上风。”王明的这一手很成功，有声有色，确实博得了一些人的好感。为了把忠于共产国际的王明扶上台，米夫也费了一番苦心。他心里明白，按照正常选举程序，像王明这样名望不高的人，硬“保驾”上台，也十分困难。他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1930年12月16日这一天，米夫突然召集紧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决定撤消李立三给陈绍禹（即王明）的处分决议，并给王明戴上共产国际正确代表的“桂冠”。转眼之间，